

鲁迅如何看待“后浪”



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之我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需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

鲁迅虽然呼吁青年发声行动,但并不主张无谓的牺牲,所谓“壕堑战”,即是更灵活的斗争方式。他深深地悲痛于青年的死,因此要求“常抗战而亦自卫”。“三一八”惨案后,鲁迅的诸多杂文中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绝不认为青年是“自蹈死地”,却也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

年轻人最易有理想,也最易颓唐,这时候重读鲁迅,先生的话依旧亲切而不过时。他从不自居导师,指点青年的行动,而是甘当“历史中间物”,肩住黑暗的闸门,做青年的同路人,同时也殷切期待着青年的超越。

让我们援引他一段著名的话来作结吧:“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如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闫力元

往事

普通话是如何诞生的 都有哪些方言想当普通话

中国幅员辽阔,有着各种各样的方言体系,方言在语调上基本上互不相同,而为了广泛交流,以普通话为基准的语言体系推行了起来,但在推行普通话之前,不少地区的方言都想要以自己的官话为主,而作为首都的北京也推出了以北京话为基准的“国语”。

国语在历史上也是历经了数代演变,先秦时期推行的官话是古中原的洛阳读书音,也称为洛音,秦代、汉代、东晋也都使用洛音,不过东晋迁都南京,因此产生了金陵雅音,洛音和雅音就成了国语,隋朝在两者的基础上又推行秦音,元代则为蒙古语。

明朝时期以及清中叶以前统一都是使用南京官话,不过清中叶以后,官话就逐渐分成了南京和北京官话,主要还是推行北京官话。1911年,中华民国召开了一场“中国读书音统一会”,确定以“京音”为主的,兼顾南北的国语。

南北国语的揉和,让南北各省吵得相当激烈,1918年,钱学同甚至提出“废孔子学不可不废汉文”的主张,“老国语”就语言体系来讲,相当复杂,他提出汉字拉丁母化,一大批留洋的知识分子也是相继支持。比如蔡元培、林语堂、黎锦熙、赵元任、周辨明、许锡五等人,就主张用26个拉丁字母来代表汉语当中的声、韵、调,去掉老国语的南方尖音和入声等,这一个大改,完完全全就以北京腔为主。

推行不到两年,又出现了问题,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都没有解决基本的国语问题。1949年,叶圣陶又开始着手“新国语”,他认为推行普通话是第一要任,他认为国语理当以“北方话”作为基础,但北京腔不宜作为国语声调,这不利于孩子们学习。

1955年,叶圣陶的提议通过了,全国又展开了一场“文字改革”会议,不能用北京腔的话,粤语和陕西话被推了上去,粤语是广府民系的母语,发源于中原雅音,具有相对完整的九声六调。

粤语影响力相当大,在海外都有不少的国家以粤语作为语言基础,不过粤语只能适应沿海地区,不适应大多数地带,而陕西话就有这个优势,陕西话属于中原官话,它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开始发展。

历经十三个朝代,大概有两千多年历史,中国的文化、语言、文字都是在陕西话的基础上创立的,而且陕西话只有4个声调,比起粤语要好学得多,加上文化体系,也更加容易接受。

陕西人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下,性子十分豪爽,一口陕西话更是让人听得亲切,但最终普通话还是使用了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的方言作为普通话的基础,滦平话比北京腔更字正腔圆,在语感上更加显得清晰明确。

□清风 钩沉

时,发声依然是需要勇气的行为。青年人依旧需要为这个社会贡献更多的声音。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纪念,而在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这段引文出自鲁迅另一篇著名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提到的是“左联五烈士”的往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因而一直受到国民党的镇压。1931年初,由于共产党内王明大搞“宗派主义”,党内一批他的反对者在上海举行秘密集会,然而叛徒告密,导致与会36人被捕,其中有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四位左联成员,和曾经出席左联成立大会的李伟森。2月7日深夜,他们高唱《国际歌》走向了刑场,慷慨就义,因此被称作“左联五烈士”。

鲁迅也因此事受到牵连,一度离家避难,但他并未因此胆怯,而是更坚决地拿起了投枪,接连撰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进的血》《柔石小传》等文章,抨击国民党当局倒行逆施的残暴行径。他对于青年的死总是很悲痛的,正如《为了忘却的纪念》中两次出现的那句:“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

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

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啰”。

中国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小鬼即其一),因此,就难于耐久(因为开首太猛,易将力气用完),也容易碰钉子,吃亏而发脾气,此不佞所再三申说者也,亦自己曾经实验者也。

这是鲁迅对于青年另一方面的敦促和勉励,同样的意思在《上海文艺之一瞥》、《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等文章中也有体现。如评论部分青年革命文学作家时(如成仿吾),便说“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中也直称:“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阔论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

这段引文出自《三闲集》中《无声的中国》一篇。这篇文章是鲁迅在香港青年会的演讲稿,实际上仍在讨论白话文与古文存废的问题,为白话文运动摇旗呐喊。因此,他希望年轻人可以“推开了古人”,用白话文勇敢发声,“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这些话在当代中国也依旧不过

人命的罪孽。”

青年应该如何看待这类导师呢?鲁迅在《华盖集》中《导师》一文中曾有精彩的观点:“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我现在是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在。但请不要误解,我并非说,譬如在国文讲堂上,应该在抽屉里暗看《红楼梦》之类;乃是说,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这段引文出自《而已集》中的《读书杂谈》,是鲁迅在广州知用中学的演讲稿,谈论的是青年的读书问题。关于青年的阅读,鲁迅的论述甚多,这一段主要是讲知识面应该尽可能广,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尽可能了解其他学科的知识。

除此之外,鲁迅谈论读书最著名的,应该是他“少读中国书”的观点了。他在《青年必读书》中提到:“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一直认为读多了古书,或许会受到毒害,“背了古老的鬼魂”,因此希望年轻人能多读外国书,多行动。这一观点贯穿始终,乃至1930年代还因为施蛰存推荐读《庄子》与《文选》一事大动肝火,以为施蛰存这类“新式青年的驱

冼星海在延安鲁艺执教



冼星海指挥排演《黄河大合唱》

感。到延安后不久,他即创作完成了《生产运动大合唱》这部作品。该作品以载歌载舞和戏剧表演相结合的形式,通过“春耕”“播种与参战”“秋收突击”和“丰收”4个场面,表现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产劳动和抗战生活,音乐具有民间风格,合唱粗犷质朴,其中的《二月里来》和《酸枣刺》两个段落,常被作为独唱和童声合唱曲目,流传至今。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运用如独唱、齐唱、领唱、轮唱、合唱和有说有唱等多种军民喜闻乐见的演唱形式,创作出近百首反映抗战和革命题材的音乐作品。冼星海还创作了《牺盟大合唱》等大型作品,以及《赞美新中国》《军民进行曲》《黄河之恋》《三八妇女节》《梁红玉》《打倒汪精卫》等歌曲。这些作品一经发表,便被抗日军民争相传唱,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冼星海也因此被誉为“人民音乐家”。

在延安“鲁艺”任教时期是冼星海音

乐创作的巅峰期,提到冼星海在这一时期创作的音乐作品,就不能不提到《黄河大合唱》。1939年3月,冼星海去看望青年诗人光未然,听其朗诵了《黄河吟》。武汉沦陷后,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队进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途中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高亢、悠扬的船工号子。1939年1月光未然抵达延安后,便创作了朗诵诗《黄河吟》。这组诗以黄河这一中华民族的象征为贯穿形象,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和不屈服的斗争精神。在艺术上,全诗构思完整,布局讲究,同时,由于诗人从中国传统诗词表现手法上吸收借鉴,组诗节奏明快,语言凝练。冼星海听后顿产生共鸣,表示要为演剧队创作《黄河大合唱》。回家后,他乐思如潮,奋笔疾书,经过六昼夜的不眠不休,完成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谱曲创作。半个月之内,他又连续完成了该作品八个乐章及伴奏音乐的全部乐谱。除“黄

河怨”“黄河颂”两章修改过几次之外,其他部分都是一气呵成。《黄河大合唱》将民间说唱音乐与战斗性的群众歌曲音调完美结合在一起,将西方音乐和中国民族精神、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相融合,兼具交响性和广泛群众性的特色,富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中国气派和时代特征。这部反映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音乐巨作,在中国抗日战争风雨如磐的岁月里横空出世。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杰出、影响最大的一部大型声乐套曲,成为冼星海音乐的最经典之作。这部作品分为“黄河颂”“保卫黄河”等八个乐章,采用了齐唱、轮唱的演唱形式,两年后又将其修订为五线谱与管弦乐伴奏。全曲气势磅礴,将时代精神和民族气魄与大众艺术形式紧密结合,歌颂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画面。冼星海在《创作札记》中写道:“我有我的人格、良心,不是钱能买的。我的音乐,要献给祖国,献给劳动人民大众,为挽救民族危机服务。”

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公演。5月11日,在庆祝延安鲁艺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晚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观看了由冼星海指挥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后,连声称赞。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看过演出后,于7月8日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黄河大合唱》诞生不久,就作为爱国救亡的精神号角,被广大中华儿女广为传唱,并于1939年下半年传遍中国,飞向世界。这部音乐作品曾在纽约、伦敦、莫斯科演出,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冼星海的名字也因这首歌曲而家喻户晓。

□陈宇

人物春秋

怅然而作《错名歌》

语林指瑕

(将齐桓公错作齐恒公) 南宋起义为杨么,以么作么欠思量。(将杨么错作杨么) 名士称衡非鞞衡,击鼓骂曹性傲狂。(将称衡错作鞞衡) 创立魏国非阿瞒,曹丕代汉野心张。(将魏国建立者的曹丕错作曹操) 袁谭本是袁绍子,以“水”代“言”已荒唐。(将袁谭错作袁谭) 昏昏晋室八王乱,“父”错作“义”恼人肠。(将司马乂错作司马义) 征西将军乃庚亮,以庚作庚人迷茫。(将庚亮错作庚亮) 杨衙之作伽蓝记,倘作犹之错难藏。(将杨衙错作伽蓝)

(将杨衙之错作杨衙之) 清皇。(将清光绪帝载湉错作载恬) 奕沂当属洋务派,混沂为沂自有妨。(将奕沂错作奕沂) 左公从未名宗裳,大名赫赫乃宗裳。(将左宗棠错作左宗裳) 一代奇人章炳麟,炳麟之号非太章。(将章太炎错作章太章) 戊戌变法两主将,新会启超不姓梁。(将新会县人梁启超错作梁启超) 耶稣本为基督主,以耶作耶事已荒。(将耶稣错作耶稣) 一歌作罢情未已,感时抚事增忧伤。中华文化雄且伟,当存敬畏慎勿忘。 □杨乾坤

某出版社出版之《听毛泽东讲史》,书中错误不少,今依次摘其人名错讹者,以歌行体列之,虽然,心犹郁郁也。文化传播者最详,人名若错属硬伤。《讲史》读罢一—数,此伤多达廿二桩。天子不能以公称,自当作周桓王。(将周桓王错作周桓公) 美籍华裔科学家,振宁姓杨非姓杨。(将杨振宁错作杨振宁) 春秋五霸齐桓公,错作恒公意难当。